

【拒绝流行】无知与批判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前段时间与一个朋友聊批判性思考的话题，他坦言当下国人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那什么是批判性思考呢？这个朋友说，批评性思考就是敢于质疑，敢于质疑领导，质疑权威，质疑结论，质疑一切未经证据确证的结论。——我后来跟他说，这可能对批判性思考的误解。当下社会最大的问题正在于，都在质疑，却没有信任，没有认知的共识。质疑是多简单的事啊，我怀疑，我怀疑，我就怀疑，但你凭什么怀疑呢？批判性思考，不是对什么都说一句“我不信”“我怀疑”“你说说”，不是瞎脱诗般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信”，不是无知无畏地怀疑一切，而是在有所信仰之下的怀疑。

就像北大才女、人民日报评论部前主任卢新宁在那篇著名的演讲中

说过的，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你凭什么怀疑，凭什么解构，凭什么打破别人的认知框架？除非你有一个更强大的框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有自己强大的逻辑。如今很多年轻人在喊着“我怀疑”的时候，心灵是封闭的，他们不是经过审慎思考和深思熟虑而决定“质疑”，而只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态度，愤世嫉俗，人云亦云，轻浮地去否定和拒绝，认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

看美国道德哲学家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他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笛卡尔在系统地提出激进的怀疑观点之前，心里装着一个大千世界。人们为了能够享受解放的狂喜，必须先体验真正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毫无偏见的头脑是空洞的。苏格拉底通过毕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现在每个高中生都懂得这个道理。



黄维傑 香港学者、作家

【含英咀华】翻译《石头记》：云石变瓦砾

拙著《文化英雄拜会记》述论的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三位哲人，都先后致谢，离开人世时都在12月。纪念其人必及其文，在本栏略道及夏余两位后，这里说说钱。

郑延国教授是一位“钱迷”，对钱学中的译学，尤其兴趣浓郁，素有研究。最近他把大量“零钱”收集贯串起来，加以说明装饰，可以成书了。所谓零钱，我指的是钱锺书的翻译论评，散见在不同钱著书卷里；郑延国把吉光片羽一一交代背景，加上注释和评论。钱如何翻译毛泽东延安讲话里所引鲁迅的名句，钱对严复“信达雅”名论有何褒贬，都有充当的“郑笺”。

《红楼梦》有不同的英文译本，一般学者认为霍克斯所译优于杨宪益夫妇，钱也如此认为。他曾致函霍克斯道：“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郑对钱氏译语加以赏析。霍克斯把《红楼梦》书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石头记》)，钱乃有上句中的story和stone两个字。钱博通中西经典，言辞美妙，把古罗马的一句名言“砖头变大理石”反转来用，以赞美霍的译本，即上引文句。怎样翻译钱氏此妙句呢，郑延国反复推敲后，得出这样的翻译：“几乎所有的译者都以为自己捧起了一块巨石，一番辛勤锤凿之后，留下的却是片片碎石，唯独霍克斯例外。”

郑译既“信”且“达”，殊不容易。原要是简练些，是否可以这样：“所得原稿是云石楼台，既成翻译若瓦砾碎片。除霍译外，所有译本皆如此。”(拙译暗藏名言“七宝楼台拆下下来不成片段”之意。)对此语钱本人会怎样翻译呢？让郑和我联名发一封微信到云端，向钱老请教？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别处生活】分布式信任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推动全面的问责制，以提高信任度和可信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制度信任作为当今全球社会的操作系统的局限性。

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我们来到一个崭新的信任阶段。保存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加密操作的制度信任并不是为数字时代而设计的，一种新的范式正在兴起，那就是分布式信任，或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直接信任。

信任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篇篇章。最早的信任是本地信任，主要在熟人社区发挥作用，基于一对一的互动以及个人声誉。接下来是制度信任：当世界步入大规模的城市化并热切展开国际贸易时，原有的本地信任无法扩展。为此，我们发明了一系列机制来确保陌生人之间的

信任，从品牌、中间商到保险、合同，乃至更完备的法律体系，它们相互支持，彼此补充，使得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然而，我们为信任的变迁也付出了代价。多年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日渐减少，而制度却变得越来越官僚化、集中化和不透明。技术现在正在利用制度的力量并对信任进行重新分配，使我们进入了分布式信任的第三阶段。

顾名思义，分布式信任将权力从单一来源中夺走，并在众多来源中分担责任。最简单的思考方法是信任通过网络、市场和平台流动。由此，信任脱离了自上而下的机构，并通过充分运用技术而将其分散化。

在第三阶段，我们将看到信任的轨迹发生巨大转变：从精英到“像你或我这样的人”；从中央机构系统到分布式技术系统。而分布式信任最新的体现就是区块链。

【生活速写】万松关遗址



蓝博洲 台湾作家

漳州闽南师范大学主办的“诗与祖国暨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活动结束后，我定于12月10日傍晚的航班返台。因为还有时间，负责接待的台籍老师问我想去哪里看看。我说：“万松关。”万松关？他一脸莫名。我说那是林文察阵亡旧址。他随即让开车的友人循着导航出发。我于是给林文察后代的台湾友人发微信说现在要去万松关，他立即回传说多照些相。替台湾历史尽点力。谢谢。

据载，林文察(1828—1864)，祖籍漳州平和，因军功历升总兵、记名提督、署理福宁镇总兵、福建陆路提督。1863年奉闽浙总督左宗棠命，围剿台湾白莲教余党戴潮春农民之乱。1864年7月奉旨赴闽，迎剿侵入漳州的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11月在万松关亲督数百兵勇，奋力围攻的数万太平军，相持五小时之久，跃马挥刀，手持数敌，身中多枪后坠马倒地被捕，坚执不降。李世贤乃以“大违天规”之罪，处以“点

天灯”酷刑。得年37岁。

万松关历来是漳州东路门户。据传唐陈元光开漳后，在九龙江滨的马岐山与鹤崎山之间开辟了一条通往京都和省城的福松路。明初，郡人沿途栽松，而被称为万松岭。万历年间，因松树稀疏，漫山迭岩，改称堆云岭。崇祯年间在岭下险要隘口筑起万松关。在朝为官的郡人林钊并为关门书写了“天保维垣”额匾。

近两个钟头后，车子盘山而上，来到以工整的花岗岩条石垒砌而成的关门。色泽略显灰化的“天保维垣”红漆额匾映眼前。匾下门洞上挂着“欢迎×××相聚万松关山庄”的横幅红布条。我追不及待地下车路勘。左侧竖着字迹模糊的“万松关遗址”石碑，但是地方政府多年前所立，不是文物。城墙下还有一排简陋的“万松关简介”看板。我仔细阅读，其中一段写道：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万松关“新杀了清朝福建陆路提督和福宁镇总兵林文察等人，闽南人民为纪念英勇的太平军，把万松关改称为万雄关”。我随手拍了照，但迟疑着要不要传给台湾的友人。

【昙花的话】芒果与猴子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最初在庭院里种下这株芒果树时，我把它当成娃娃一样悉心照顾。浇水、施肥、除虫，它茁壮成长，愈来愈高，愈来愈壮。一般来说，芒果树三五年便可结果，可是，这树，种了六七年还没有“妊娠”的迹象。

渐渐地，我对它不闻不问，它从我生活里淡出、淡出了。

没人照顾，它自求多福；餐风饮露，吮吸阳光，继续向上蹿长。

长长长、长长长。长到十多米高时，出其不意地结出了累累的果实，一串一串沉甸甸地挂在瘦瘦的枝丫上。

子结满枝的这一年，它已经15岁了。

树太高了，正乎思应该如何把果子采摘下来时，野猴却把这树化为了“花果山”。它成群结队爬上去，又采又咬，一片喧哗。果子是大地奉献给人间的精华，人猴共尝，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惹人生气的是，猴子暴殄天物，每个芒果只咬一口便弃如敝屣，弄得满地狼

藉，蚂蚁巢集。

“我连一个芒果都还没有尝到，它们却已糟蹋了半数。”我生气地想道。

拿了一根带钩的竹竿，瞎忙老半天，够不着，颓然放弃。

当天傍晚，又看到落满一地的芒果，都是被猴儿啃吃了一口的。我在清理的过程中，惊喜地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揣想是猴子采得多，兜不住，掉下来的。

急巴巴地剖开来吃，才吃一口，我便张口喊救命——那个酸啊，使我的五官和五脏都拧成了一团。

挣扎求存的芒果树，最终以自己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感受。

最可怜的是猴子，赖以生存的丛林被城市开发商一寸一寸地蚕吞了，不得已，转而到私人庭院来觅食。果酸酸得它们龇牙咧嘴，可是，为了果腹，不得不吃。吃一口，受不了，丢；然后，再吃、再丢。吃吃、丢丢，一试再试，为的是想寻觅一个味蕾的春天——它们不知道，它们吃的其实是芒果树的“怨言”——既是累积多年的“怨言”，又怎么可能蕴含甜味呢？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横眉热对】触摸

在雕塑艺术中，触摸被遗忘了。

触摸在什么时候被遗忘？在人们探捏泥巴的时候，在罗丹自以为是时候的时候。

触摸被遗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主题，同时也是一个人生的体验被遗忘了。人类历史有许多重大的缺失，这是其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缺失。

第一个把这一缺失从人类迷茫的眼神中凸显出来的是一个叫布朗库西的罗马尼亚人，有一天，他突然奇想，做了一件金属作品，题目叫《飞鸟》。实际上，布朗库西并没有做什么鸟之类的东西，他做的是鸟的飞行在空中时留下的轨迹——一种鸟在滑行中所具有的流动的“形”。简单地说就是，他触摸到了空气！然后把它塑造了出来。他要向世人表明，他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把原来隐藏在自然中的形，由无形变成了有形。

摩尔仔细盯着这件《飞鸟》。一个多么简洁，不能再简洁的形，一个多么干脆利落、一目了然的形。这是真正的启示！其重要性就是一种来自空间的对完美的视觉触摸。

触摸还有一种奇特的侵蚀性质，它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而不是古典时代那种从内向外的扩张；它包含着一种穿透形体的“空洞”，是一种连接这一面与那一面的三维空间的存在方式，是一对存在于时空中的形的手，随时都在揉捏着自然的造物，使自然的造物呈现出本质。

摩尔着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他终于异军突起，通过触摸完成了一次飞跃！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柳叶湖边

湖南常德，古称“武陵”，常德两个字取自于《老子》“为天下溪，常德不流”和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成威霸”。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可是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却很少踏足湖南，也从未来过常德。当《湖南文艺》黄斌主编在常德设立“小说写作营”的活动邀请来到时，我却一直延宕未作决定，忽然确定去，就立刻陷入高速运转的螺旋。

待得坐在机场，一下松懈下来的时候，想起在呼和浩特，因为事先未作沟通，和不期而至的文学老友“完美错过”，赶紧寻找脑际浮现的和常德牢牢联系在一起的一位作家朋友：陶少鸿。

1989年4月，我去西安组稿，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参加了他们的一个Party，也许是某人的生日？已经淡忘了。记得迟子建、熊正良、鬼子、陶少鸿、杨少衡都是先在鲁院后到这个班。记得晚会的那个房间并不大，用彩带装饰着，播放舞曲的是一张银灰色的录音机，当热烈起舞之时，舞曲却戛然而止，原来是鬼子“啪”地按下暂停键，号令：交换舞伴……那次离开西安去北京的时候，少鸿抱着一挂香蕉，隔着绿皮火车的车窗递给我，于是我化身丛林居民，一路上以此为食粮。我也陆续做了他们的贵客。

现代通讯技术，让我在到达之前，就连线上陶少鸿，他发给我一张老照片，记录的正是三十多年前那个夜晚的我们，肩肩挽手，亲密喜悦地拥挤在一起。据说，他们班已经有13人到了天上。

喜欢那个时候长发飘飘的自己，也怀念那些彻夜谈着文学的时刻。在柳叶湖边与朋友重逢，在写作营和年轻的年长的写作者交流，原来文学都是那个原点，无论天涯海角，都是我们聚会的理由，各种波谲万变的生存表达和汉语审美，也消除了彼此的时空相隔，让日常生活变得有趣起来。

澳门作家系列8



李观鼎

评论家、诗人、专栏作家，中国武侠小说宗师还珠楼主李寿民四公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原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文艺顾问，同时担任澳门笔会会长、澳门写作学会会长、澳门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积极投入澳门文学和文化建设，担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历任第二、三、四、五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较宽广的现代视野。2004年获颁特区政府文化功勋勋章。

著有文艺评论《边鼓集》、专论《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文艺随笔《三余集》、诗集《滴水集》等。主编或合作主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历代名诗今译》、《澳门现代诗选》、《澳门文学丛书》、《澳门社会科学论文选·文学卷》等。

文本 诗是什么？

诗是“斯芬克斯之谜”，是俄狄浦斯王子过于简单的回答之后，关于“人”的持续不断地追问和思考。

诗是敬畏，哪怕只写一个宇，也要写得端庄正正。

诗是坚守，即使生命之树已经枯荣，只剩下一叶凌空，也要做一簇金色的舞。

诗是心的跳动，容不得半点杂音。

诗是一尘不染，是说出“皇帝的新衣”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勇敢和纯真。

诗是滴水，是含着整个太阳的光彩，一点一点地对心灵的浸润。

诗是钟情，是比萨饼塔般数百年如一日的倾心。

诗是追求，是地老天荒时

呈现澳门文学的“中国心”

《三余集》收入了澳门最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李观鼎先生这些年的文艺评论文章数十篇。这些文章站在文艺思想和理论的高度，从作品和文艺现象的层面入手，比较全面地考察研究评价澳门文艺这些年特别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以来的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状况。在评论学者、作家庄文永时，李观鼎专门引述了庄文永的论述，指出：“澳门文学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葡萄牙人虽管治澳门几百年，但葡萄牙文化并没有真正渗透进澳门社会，占澳门人口90%的华人是澳门社会事实上的主体，这一社会的事仍是中华文化。”文化土壤如此，文学精神更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也无法分割。这种血脉关系，符合澳门文学进步的实际，也是澳门文学繁荣的思想基础与发展方向，更是推动澳门文学参与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动力之源。这部评论集思想的坚实，立意的高远，品质的优秀，抓住了澳门文学的灵魂和核心价值。

这些正确认识的展开，不仅对澳门文学艺术发展进步有深刻意义，也对内地文学工作者认识澳门文学艺术的本质有着正确的引导。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与澳门文学艺术交流沟通不够，认识不清晰。现在，澳门回归后，交流沟通虽然多了，但认识仍然还很不够，很不到位。《三余集》设置了许多路标，

作为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澳门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版图的路径，引导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澳门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应该对在那个漫长而艰辛历史岁月中，以一颦不变的“中国心”顽强奋斗的澳门文学艺术高度评价和尊重，对澳门文学艺术一点一滴的发展进步都应该怀有深深的敬意。

《三余集》立足于澳门文化地域，重心放在澳门作家、艺术家的具体的创作实践，探寻考量澳门文学的发展规律，支持推动广大澳门作家、艺术家多出精品力作，讲好澳门故事。读《三余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李先生不仅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学理论学识。他能够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实，真诚而严肃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的文艺评论。对于一个评论家来说，率真鲜明的批评勇气更为重要，对创作的作用更为直接。在《我看振兴》《于丹现象》《由“寻找金庸”想到的》等文，就体现出这种平等且真诚的评论姿态，都是非常专业到位的评论。而在《平面化：当代审美符号的意义指向》《世俗化：当代审美精神追求的嬗变》《新奇化：当代审美的非精神取向》这三篇文章，既有学术含量，又有思想高度，在尊重一些现代派倾向的创作的同时，又指出了这种创作倾向的倾向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深度消失”以后，“精神虚

无”是否会随之而来呢？

由此，我们更会注意到，李先生的批评观与民族文学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与新中国时期形成的当代文学精神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他对现代派文学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一些现代派文学的文本，有着深入的读解，例如《荒诞的艺术》《说“荒诞”》等文，就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派戏剧认识相当深刻。但他的思想显然更倾向尊重文学与时代、与现实、与人民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主张文学深刻地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有“深度”的人物形象，讲好澳门自己的故事，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中，树立起澳门文学的形象。这部文集重点评论的还是那些具有经典意义文学作品的规律方向上。这样的观点，散化在他的作品评论以及文学随笔之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构成了他的评论思想的基调，对澳门作家艺术家写好澳门故事有着积极的引导支持作用。

对如何写好澳门故事，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揭示深刻的人性，李先生在《三合集》做了深层的思考。在《澳门文学的“非生产劳动”》一文中，他说：“在文学已经相当普遍被边缘化的今天，澳门文学却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学的本真，这是难能可

贵的事。”何谓澳门文学的本真？那就是“涌动着一自甘艰苦，自甘寂寞的诗性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澳门作家正在发出越来越多的如葛塞尔所说的灵魂的微笑”。在《澳门文学批评一瞥》一文中，他说，“澳门文学批评语境里，并未出现过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大众传媒操纵下产生的那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他讲的是文学精神品格坚守，也是一种文学规律原理的坚守。他的这些思考，非常有现实的针对性，思想意义就会特别突出。

澳门以博彩作为支柱性产业，是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各种流行时尚的诱惑实在太多了，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文学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生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然而，澳门文学就这样生长起来了，开出了美丽动人的艺术之花。这其间最根本的就是作家、艺术家的心态、精神和品格。他们面对复杂利益时代，不为所动，从容应对，坚守着自己心灵的淡泊与宁静，坚守着对文学对文化的信念与理想，坚守着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有了这样的思想文化“定力”，才能站到时代精神的高地上，才能真正把握文学的本质，才会让文学有人性深度而发出“灵魂的微笑”。这样的澳门故事，才是我们时代的故事，才是现实最需要的故事。讲好澳门故事，评论家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和作家一样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观鼎的诗变

□孙绍振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李观鼎就是我的诗友。那时的诗和现在的不大相同，不是诉诸个人，而是诉诸群众的。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写好了诗拿到广场上，到集会上去朗诵。观鼎那时，意气风发，不但着迷于写诗，而且热衷于朗诵。不单是在通常的朗诵会上，而且是在劳动的工地上，在走向田野的征途中。那时的诗作，真是火热的，但是，今天看来，留在文字上的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色彩，绝对丧失了记忆中的那种热烈。

为什么在那么热烈的现场，那么真诚的梦想，变成文字以后，在经过时间汰洗以后，竟变得那么单薄，那么苍白？浪漫的真情并不虚假，为什么那样难以留在纸上化为永恒？那么鲜活的心灵的震荡，为什么还不及一砖一石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间包含着艺术的奥秘，可能要留待不同流派的文学理论家们长期的争辩。

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经历了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后，观鼎的诗风变了。主要的表现是，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热衷于情感的宣泄了。

他像同时代的诸多诗人那样变得冷峻起来了，不但不那么乐于袒露自己太容易激动的情怀，相反，他显然是追求者，尽可能地收敛着，掩藏着自己的情感。这也难怪，sentimentalism，本有一个不难听的译法，叫作“多愁善感”，现在却译成了“滥情主义”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观鼎变得内向了。内向，一方面意味着感情的节制，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思想的丰富。不管是在旅游途中流连风物，还是在夜夜晚的灯火凝视自审，他的感情是谨慎地收敛着，然而他的思绪却紧张地翻腾着。他的纷纭的思绪迅速地凝聚起来，变成深刻的人体悟。哪怕是对着自己的躯体，他的思想也没有闲着。比如对于自己的手，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伸出来/便是/自己的/形象/有

长有短/有曲有直”。他的追求似乎是：即使是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现象，他也要从中中提炼出不平常的思想，甚至是哲理来。这几乎已成了他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看看他的组诗的题目吧：《沉思》《自语》《风物》《价值》……就可以想象，他的思想如何不停地运转，似乎是每一种感觉都足以推动他的思绪深化、凝聚，他老处于某种自言自语，不由自主地提炼升华思绪的状态。有时，他的思考是针对现实的，其中充满了对于城市生活的针砭，如：在《性器官》这样的标题下，有这样的诗句：“灵魂 贫困到极点时/也就不再在乎/出租或出卖……”如此尖锐的剑拔弩张式的讽刺，在现代诗人中是很少见的。有时则不是这样辛辣，而是广泛地面向生活，如《门》：“该开的时候 开/该关的时候 关/不容易……”上升成为生活的格言，容易失之紧张，只有在紧张中现出从容，才是上品。到了这种境界，就写出了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如《影子》：“说什么 形影不离/黑暗 刚刚逼近/它就 躲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几乎时时处在一种提炼的过程中，好像总是在苦吟。我不禁担心，不管面对什么对象都这样，不是太累了么？但是，从他的语言和文字来看，他的思想总结得很快，他的文字也没有留下刻意的痕迹，他几乎是左右逢源，轻松愉快地让他的思想变成人生的哲理和格言。

当然，这种升华的方法，对于他来说，比较自在，但是思绪来得太快，就很难保证每一行诗都有充分的深度；这就产生了一些过分的轻快，轻快得有点轻浅的作品。当然这也不全是归咎于他的轻快，同时他也不能不看到他太过耽溺于哲理。而在他的一些比较长的作品中，他的感觉和理性之间有时取得了某种平衡。比如《落叶礼赞》，感觉比较丰富，理性也就有了依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制约，从诗的可感、可亲来说，比之前面所说的小诗似乎更加动人。